1995 年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进展*

曾景忠

1995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 出现了抗战史研究的热潮。全国各地举办了多次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其中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学术讨论会最为盛大) , 出版了一大批抗战史著作。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全部出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抗日战争时期三卷出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均推出了抗战史丛书。重庆出版社出版了重庆抗战丛书。在发表的抗战史文章中, 阐述、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和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者, 占了相当大的份量。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进展不大平衡, 有关侵华日军的罪行暴行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等课题进展比较明显。

现将全年抗战史研究情况分类作一概述。

一　有关侵华日军的罪行暴行

抗战史学界对侵华日军的罪行暴行研究比较重视, 1995 年披露出版了一些新的资料。

1995 年 8 月, 在石家庄市举办了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日学者对日本强掳、虐待中国战俘劳工, 日军屠杀重大惨案、日军使用细菌化学武器等进行了研讨。

---

* 本文系为《中国历史学年鉴》而作。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新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有的刊物译载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载有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内容的日本外交文书，其中广田外相1938年1月17日致日本驻美使节的一份电报称："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暴行的手段，……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①] 这为日军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确实是30万人以上提供了有力证据。章开沅教授翻译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所藏《贝德士文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撰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为这一课题研究的新成果。[②] 1995年还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④]、《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⑤] 等资料。

有关日本侵略强掳虐待中国劳工问题，研究取得了进展。何天义论证了日本强掳800多万中国人到"满洲"和日本，其中掳至日本的4万中国战俘劳工，惨遭奴役虐待，7000人死于东瀛。[⑥] 居之芬根据天津市档案馆馆藏，考订1936年—1945年8月9年8个月间，日本从华北贩卖强征出境的劳工为704.7万余人，随行家属223.7万人，二者合计928.4万人。[⑦]

此外，还出版有《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南京大屠杀图证》（吉林文史出版社）、《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人民出版社）、《血证——侵华日军暴行纪实日志》（成都出版社）等。《日本

---

① 吴天威辑译《美国新公开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②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书局出版。

④ 朱成山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⑤ 汤美如主编，章开沅编译，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⑥ 何天义：《日本侵略者强掳虐待中国劳工的真相——驳斥日本某些为强掳中国战俘劳工辩解的言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

⑦ 居之芬：《日本强掳华北劳工人数考》，《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侵华罪行实证》系北京市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卷宗, 1946 年初—1947 年初河北省司法行政部门对河北、平津地区日本罪行调查的证据材料选编(762 件) , 符合法律取证规范。

1995 年还发表了一些论述日本在华实行细菌战、使用化学武器等罪行的论文。① 王瑞珍《有关日本对在华第三国侵害的一些情况》一文, 论述了侵华战争中日本夺取公共租界管理权, 夺取中国海关管理权, 抢劫第三国在华产业和财物, 炸毁第三国使领馆、教堂、医院、学校, 伤害第三国官员和侨民等罪行。②

二　有关中国抗战政治

1995 年有关中国抗战政治的研究进展不多。

金冲及论及日本加紧侵略华北, 华北事变激起强烈要求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他比较了北平、上海两地抗日救亡运动的不同特点: "北平的救亡运动博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 一部分教育界人士也积极参加, 但主力仍是学生。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从一开始, 社会面就广泛得多, 包括文化界、妇女界、学生界、教育界、商业界等。'联合战线'的口号喊得最早。在运动发展过程中, 工作上策略上脱离群众的缺点也少一些。"③ 杨奎松根据 1936 年 6 月 30 日刘鼎致中共中央、7 月 2 日洛甫致共产国际和 8 月 15 日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三份电报, 论述张学良曾要求加入共产党, 中共中央拟允其入党, 因共产国际否决, 此事未成的情况。④

陈廷湘论述了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民主政制建设的情况: 施

---

① 如, 李力、郭洪茂: 《论日寇浙赣细菌战及其后果》, 《社会科学战线》1995 第 5 期; 霍燎原: 《日本关东军第一　　部队的罪行》, 同上, 1995 年第 4 期。

②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③ 金冲及: 《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 《历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④ 《有关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 《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行以真正平等原则建立各抗日阶级联合执政的政权的方针，实行“三三制”，解决党政不分问题；严格选举制度，引导民众参政；采用参议会这种代议制政体，发挥民意机关监督行政司法，加强民意机关与公民的联系。①

一些学者论述了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豫湘桂战场溃败引起的大后方人心变动和中共“联合政府”口号提出的过程。金冲及论及：豫湘桂战场中国军队的溃退“引起的最重要的人心变动是，大后方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看法普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高昂”。“随着国民党的统治危机空前严重，国内要求民主的不断高涨，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废除一党专政，改组政府成为普遍的呼声。”这就使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时机走向成熟。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上，林伯渠公开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掀起了巨大的波浪”，“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大后方人心的变动，“造成强大的冲击波，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局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国民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② 杨奎松考察了中共“联合政府”口号提出的过程，源于国共实力对比的变化，与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役中失败和美国影响等因素有关。抗战初期，中共在国共谈判中的方针是：在保证中共组织独立的条件下，“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直到皖南事变后，公开场合仍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联合政府的设想最初是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来的。中共中央注意到联合政府这种形式，与随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谢伟思有关。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会议以后，中共“才最终确定了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联合政府来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他还分析到，在争取实现“联合政府”的过程中，经

---

①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抗日战争研究》增刊，1995年。

② 《抗战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历过赫尔利调处, 中共拟成立解放区委员会, 国民党拟延请中共和其他党派人士参加在行政院下设置内阁性质的机构作为行政院的决策机关, 中共提议召开党派会议, 国民党提议举行政治咨询会议, 直至重庆谈判,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作出改组政府的决议等情况。[①] 有的学者认为, "联合政府"口号是由罗斯福提出的说法, 是一种"误传", "联合政府"口号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②]

三　有关中国抗战军事

1995 年抗战史研究中, 对中国抗战军事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李继华提出, 对抗日战争中敌我战略攻防的阶段划分, 应分两个层次: 一是抗战总态势, 中国只有总体上的战略防御, 而没有将战争推进到日本国土上的战略进攻。一是在战争总态势中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中, 抗战分三个阶段: 敌之战略占领、我之战略退却; 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 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③]

对于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 一些学者继续进行研讨。阮家新提出: 对两个战场的考察, 有必要确定一个新的出发点, 即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间的战争, 只能把日本看作交战的一方, 把中国看作交战的另一方, 而决不能把中国抗日战争割裂开来, 看作是两国三方的战争; 不要把国共纠纷与抗日战争扯在一起, 混为一谈, 这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两个战场的出现是由敌我力量对比而决定的, 是统一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以空间换取时间而达到持久, 在持久中消耗敌人而争取最后胜利) 下合理的分工。两

---

① 《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 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② 冯蕙: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此文载《人民日报》1995 年 9 月 13 日) 。

③ 《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层次与阶段划分》, 《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3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个战场互相配合，互为依存，相辅相成，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只是抗日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统一的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能割裂的。[①] 有关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过去大陆一些论著多论证中共敌后战场作战对正面战场的配合作用。刘贵福则论述了国民政府军队配合中共军队作战的一例。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和第二战区对八路军百团大战极为关注，蒋介石曾下达训令，第二战区卫立煌、阎锡山曾部署策应配合中共的百团大战。[②]

对国民党军在敌后作战情况，有些学者开始重视。《坚持抗战·苦撑待变》一书中单列《国民政府军敌后抗日游击战场》一节。对于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场问题，学者们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国民党军对日作战，既包括正面战场，也包括敌后游击战场。有人则认为，国民党军在敌后虽有游击队，但绝大多数没能坚持下来，没有形成战略意义上的游击战场。[③]

对中国抗日战争后期有无战略反攻阶段，抗战史学界认识不尽一致。持有战略反攻阶段观点的学者，对战略反攻何时开始也说法不一，有 1944 年初说者，有 1944 年夏说者，有 1945 年春说者，有 1945 年 8 月上旬说者。[④]1995 年有些学者论证抗日战争存在战略反攻阶段。从 1944 年初起，中国军队先后在几个重要战场上转入了局部战略反攻，使中国抗战脱出了持续多年的相持阶段，步入了战略反攻的新阶段。战略反攻不单单指全面战略反攻，也包括局部战略反攻。局部战略反攻的实施标志着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局部战略反攻开始时，盟国总的力量已绝对占优势，中国战场上敌强我弱只具有相对性，局部地区我方已具有优势（如滇西缅北反攻）。

---

① 《关于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再探讨》，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② 《国民政府军队对百团大战的反应和策应配合》，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2 期。

③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人民日报理论部举办抗日战争史学术讨论会综述》（以林），《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3 期。

④ 参见《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郭德宏），《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4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这就是说, 中国抗战具备了战略反攻的基本条件。1944 年, 中国军队在敌后和西南两个战略方向展开了局部反攻。西南方向反攻胜利后, 1945 年春, 中国制订了桂柳反攻计划, 5 月湘西会战大捷展开了东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5—7 月, 中国军队相继收复了南宁、柳州和桂林。8 月开始了全面大反攻。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有两个明显特征: 1、由于中国海军空军力量薄弱, 不象其他 国家反攻时具备渡海登陆、直捣敌巢的条件, 反攻主要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收复失地和配合盟军作战。2、中国战略反攻虽然不象欧洲战场、苏联战场进行大兵团的势如破竹的战役, 但与其他盟国一样, 具有对侵略者发动进攻的战役增多增大、向城市交通要道进攻、攻势迅猛的特征。[①] 有的学者则认为, 1945 年 4 月, 国民党抗日战场以打响湘西战役为起点, 向日军展开了战略反攻。[②]

由研讨中国抗战战略反攻阶段而导致了对 1944 年中国抗战战局的新认识。以往均以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场大溃败来概括这一年的抗战军事。现在一些学者分析: 1944 年日本在豫湘桂战场发动的一号作战, 没有达到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美国空军基地和压迫国民政府投降的目的。"对 1944 年至 1945 年初中国战场的形势, 不能因一个豫湘桂失败就得出局势恶化了的简单结论。"局部失败不能掩盖中国军队同时期反攻胜利的事实(敌后和西南方向)。"用互有攻守, 各有得失来概括 1944 年的战局比较恰当。"深入分析中日双方的得失"对战略全局的影响和作用, 则不难看出中国得大于失"。[③]

四　有关中国抗战时期的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

抗战史研究中, 经济、文化、教育、思想和社会生活等内容比较

---

① 贺新城: 《论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 《中共党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
② 刘五书: 《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 《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3 期。
③ 前引贺新城、刘五书文。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薄弱, 1995 年出版的抗战史丛书中涉及这些方面的课题, 另有一些论文作了零星的研讨。

抗战时期经济方面, 有关日本对华北经济掠夺的论文间或有发表, 如曾业英《日本侵占华北海关及其后果》[①]、张利民《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与日本政府和军部》[②] 等文, 另有《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资料[③] 出版。

对于抗战时期高等教育事业, 余子侠和房列曙所撰二文作了系统的研讨。余文论述抗战时期内迁高等学校有 100 余所, 除长途内迁至大后方的外, 还有迁至省内边远安全地区的, 另有极少几所迁入上海外国租界和香港。他认为, 高校内迁的意义是: "保存了中华民族最精要的资本, 促进了抗战事业的进步和胜利, 有助于后方经济建设和中国现代化事业, 促进了贫瘠落后地区教育的现代化。[④] 房文论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因为弥漫的战火而中断, 而且还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学校数、学生数和毕业生数均有较大的增加, 学制建设、教学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有明显成绩, 改革了入学考试制度、毕业考试制度, 举办了学业竞试。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 为抗日战争贡献了力量, 推动了科学研究事业取得突出的成就, 推动了西南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战时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在于, 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重视教育, 有 "战时须作平时看" 的指导思想, 广大知识分子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⑤]

闻黎明《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文, 概要地介绍了抗日战争期间文艺作品的情况, 阐释了其中表现的民族觉醒意识, 和对现实中的黑暗、腐朽所作的揭露和鞭挞, 以及抗日根据地文艺

---

① 《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② 《历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③ 居之芬主编, 北京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④ 《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6 期。
⑤ 房列曙: 《论抗战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 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作品中歌颂光明赞美未来的心声。[①] 丁守和《论抗日战争的思想文化》一文, 综合性地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文化、思想、学术状况。其中述及思想学术思潮, 包括冯友兰的新理学、胡秋原的民族主义, 贺麟的儒家思想新开展, 战国策派陈铨、林同济的战国意志观, 以及国民党的民主主义、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等。[②] 黄岭峻著文, 对抗战时期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潮, 和以林同济、陈铨和雷海宗为代表的"战国策派"的思想作了剖析。他认为: 提倡复兴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尽管他们在外表上言必称孔孟, 但其思想内涵与传统儒学并不一致。冯、贺、钱三人都比较看重道德的力量, 但冯、贺还是希望以道德补科学的不足, 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归于"泛道德主义"。"战国策派"曾对政府表示过支持, 但它与国民党当局不可能是亲密无间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战国策派"共同一致主张"抗战到底"。二者将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推向了极致。但他们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 对当时的"恐日症"不啻是一付解毒剂。[③]

何友良《略论中国农民与抗日战争》一文, 对战时农民的贡献与牺牲作了简要论述, 并论及: 农民对国共两党的观感和认识有明显区别。农民在抗战中"对中国政党进行着选择, 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和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④] 刘悦清分析了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 思想上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初步与工农结合; 改变了阶级属性, 实现了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 确立共同的革命目标, 实现了各界知识分子的大团结。[⑤] 刘一皋论及

---

①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② 《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

③ 《试论抗战时期两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潮——保守主义与"战国策派"》, 《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2 期。

④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⑤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中共党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农村中的政治变革: 建立了村民大会等议政机构和共产党支部、农会等组织, 农村社会与外界连成一体, 被置于严密的组织网络之中, 出现了农民群众最广泛的政治参与。[①]

五　有关中国沦陷区

对中国沦陷区的研究也是比较薄弱的。1995 年有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一书出版。李侃《郑孝胥与伪满洲国初期傀儡政权》一文, 专门论述了郑孝胥这个清朝遗老在日本策动成立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中担任"国务总理", 在日本侵略者颐指气使之下, 奔走效劳, 表现得"亲密的恭敬", 还鼓吹日伪间的"王道""协和"理论。但他与日本主奴间也发生龃龉与争吵。[②]前述有关日本对华北金融的掠夺和统制的论文、资料的发表出版, 表明华北沦陷区的研究已开始受到重视。

六　有关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成绩比较显著, 1995 年继续取得一些进展, 尤其是对战时中国外交的研究更为突出。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一书出版[③], 此书对战时中国外交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该书序言认为: 战时中国外交"有许多辉煌的篇章"。"抗战时期中国政府制订并贯彻了务实的外交政策, 谨慎处理与各国的外交关系, 力求多寻友国, 减少敌国, 搁置分歧, 求同存异, 使国际环境于中国有利。""战时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它既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努力,

---

① 刘一皋: 《抗日战争与中国北方农村社会发展》, 《中共党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② 《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③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的本身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全民族的抗战是影响中国外交的最根本因素。”“战时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是中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期斗争的结果。”中英新约谈判中在新界问题上对英让步，按雅尔塔协定框架与苏联签订条约，表现了“国民政府的弱国外交”，这反映了“中国虽已取得大国地位，但还没有取得强国地位”。

王建朗分析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为“苦撑待变”：国内战场坚持抗战，外交战线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战线。当时中国外交的战略是：中立德国，不使为敌；联合苏联制日，争取军援；依靠英美，力促其变，推动它们走上援华制日道路。作为一项总的抗日战略，“苦撑待变”不免带有消极性质，有过度依赖外援之嫌，而就外交战略而言，“苦撑待变”仍不失为一明智的政策。在半殖民地的弱国，努力获得各种外援是外交的首要任务。“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外交方向是正确的——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国，争取了友邦。它表现了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少有的主动性灵活性，基本上是成功的，为整个战时外交奠定了基础。①

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研究中，中美关系研究居于突出重要地位。王建朗认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外交侧重点由对美外交取代了对英外交，对美外交为首要重点的外交方针，目的是借助美国力量限制英国的可能的对日妥协。② 吴景平著文对战时中美租借关系作了系统的研讨。吴文说：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是两国为共同抵御日本侵略扩张而建立的以军事互助为主要内容的特殊经济关系。1941 年 5 月，美国宣布中国可获得租借援助。抗战时期中国获得美国租借援助 8 亿美元左右，与其他有些盟国相比，中国获得的租借援助较少，与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也不相称。其

---

① 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② 前引王建朗文。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原因，一是运输困难，一是美国的“重欧轻华”方针。不过美国租借援助是战时中国获得的数额最大的军事援助，也是战争后期中国最主要的军援，对支持中国抗战和战时财政金融均有积极作用。同时，战时租借关系属于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基础上相互援助的关系。一方面中国获得美国租借援助，主要是军援物资。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作出回惠租借援助，自1942年起，中国向在华美军和官方机关提供物资、劳务、修建机场和军事基地的费用垫款。回惠租借援助协定的交涉历经波折。中国为美方垫款甚巨，加剧了国内物资匮乏、物价腾涨、收支失衡、通货失控。为履行回惠租借的义务，中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① 任东来撰文专门论述了1944年中美之间有关中国要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驻华美军开支和美军成都机场修建费用的支付这两个问题，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其中涉及美国黄金运华和支付在华美军费用时美元与法币的汇率折算等问题。任文既批评了中美谈判过程中孔祥熙顽固坚持美元与法币的固定汇率，以不合理的汇率去补偿没有得到的贷款，结果“导致美国停运黄金，拖延美元支付，最终让国家付出通贷膨胀恶性发展的代价。这实在是得不偿失”；同时也分析到，“长期的战争几乎摧毁了本来就不强大的中国经济。而美军在华的庞大开支更加深了中国的财政危机。国家和社会有限的财力实难承受日益增加的战争负担，中国的确需要美国的财政援助”。而美国军方和财政部对中国这样一个盟国“实施军事和财政制裁”，“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作法“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外交中的强权政治因素”。中美之间在这一局部的冲突与史迪威事件，是集中体现1944年“中美关系全面危机”的“两起重大事件”。②

牛军从分析开罗会议历史背景的角度论证战时中美关系：中

① 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② 任东来：《被遗忘的危机：1944年中美两国在谈判贷款和在华美军开支问题上的争吵》，《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美战时同盟是建立在脆弱的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双方在对日作战、对苏关系、国共关系这三个问题的处理上，“从出发点到政策的制订和实施，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双方的“关注点”也各异。“美国注重的建立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中美战略关系；国民政府关心的是如何维持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他认为：“开罗会议是战时中美双方确立战略关系的努力的顶点。”[①] 有关开罗会议是不是战时中美关系变化的转折点，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时殷弘认为：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对华政策思想，以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为界标分前后两形态：一是“把中国当大国对待”为核心的形态，一是以促进苏蒋接近和国共统一为特征的形态。它们在“基本假设着重点”、政治与战略含义和实施方式等方面都大有区别。他主张以此为界标划分战时美国对华政策，乃至中美关系。[②] 任东来也认为：中美抗日同盟关系开罗会议时“发展到顶点”，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开罗会议也成为战时中美同盟关系的‘分水岭’”。[③] 陶文钊则认为：“开罗会议不是中美关系或美国对华关系的转折点，而是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起点。”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的失信以及 1944 年春迫使蒋发动滇西反攻战，无疑使开罗会议期间达到高峰的中美关系的热度下降了不少。但开罗会议后，美国对蒋的态度没有根本转变，罗斯福扶植中国成为大国的想法未因开罗会议而改变。美国对华政策抗战时期是扶蒋容共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为扶蒋反共，政策转变是 1944 年 9 月—1945 年 4 月。[④]

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史研究方面，1995 年续有进展。李嘉谷揭示了抗战初期中国希望苏联出兵中国抗日，杨杰赴苏交涉过程中，杨杰、张冲误传苏联考虑“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本开战”的

---

① 牛军：《开罗会议与战时中美关系》，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② 时殷弘：《美国与现代中国——《中美关系史(1911—1950)》评析》，《历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③ 任东来前引文。

④ 陶文钊：《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吗》，《历史研究》1995 年第 6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表示，致蒋介石一直认为苏联曾答应过参战的情况。[①] 李嘉谷不同意对苏日中立条约的评价只提对中国抗日战争不利影响的一面，他认为，该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外交的一个胜利，它保障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使苏联能集中力量对德作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有全局意义的。""然而，苏日中立条约所附宣言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②]

围绕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学者们对于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和条约性质作了研讨。郭秋光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基本上以两大主题，即抗日和反共为目标。"1941年以前，国民政府实行了联苏抗日的政策。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的下降，反共逐渐上升为对苏政策的主要目标。"到1943年以后，国民政府逐步形成了确立限制苏联支持中共，进而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的法律依据的对苏政策。""《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固然是雅尔塔协定具体化的产物，……也是国民政府推行其抗战后期的对苏政策的必然结果。"[③] 刘存宽分析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性质："尽管由该约所追认的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促进了日本侵略者的无条件投降，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然而无论从条约谈判的背景、谈判进程和条约的内容看，这个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条约的提出和条约的基本内容，"是苏美英三大国首脑在排斥中国参加的情况下，背着中国在雅尔塔事先秘密决定的"；其次，"条约的谈判是在苏联的高压下进行的。苏联几乎是强迫中国接受其各种苛刻条件"；最后，有关旅大、中国东北的铁路和外蒙

---

① 李嘉谷：《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前引李嘉谷文。
③ 郭秋光：《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问题等权益, “条约及其各个附件, 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 ”。[①]

1995 年有关战时中日关系的论著较少。俞辛焞论述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战时外交中的 “满洲国问题 ”: 先是想使国联和中国承认 “满洲国 ”; 中日战争前期, 日本又以 “胜利 ”为后盾, 强制要求中国承认; 日美谈判时, 日本要求美国予以承认; 战争结束时, 日本又利用 “满洲国 ”问题作筹码, 想以国际共管 “满洲 ”求得日美媾和, 又以满蒙权益诱惑, 妄图求得苏联的中立。这充分证明 “满洲国 ”的傀儡性, 和 “满洲国问题 ”上 “日本外交中的帝国主义利益 ”。[②] 杨天石根据档案资料, 揭示了抗战时期孔祥熙主使下, 多条线索与日本方面秘密和谈的情况。他认为, 孔祥熙主和的原因, 除对日抗战信心动摇外, 也有其对日试探的目的, 探询日本真相, 分化其国内 “和 ”战两派势力, 促使其对立, 并有破坏伪政权成立的企图。[③]

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密切, 尤其在中国抗战时期, 韩国独立运动更为活跃。中国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也是抗战史研究的一项内容。1995 年 4 月,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与韩国韩民族运动史研究会联合举办韩国独立运动学术讨论会, 对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讨。石源华编著的《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编年资料) 出版, 石的题名相同的论文, 分别以北洋军阀集团、孙中山为代表的护法派、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为对象, 考察其对韩政策的演变, 研讨其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④]

王真对抗日战争中中国国际地位提高, 跻入 “四强 ”行列的历史根源作了探讨。他认为: “抗日战争为中国改变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持久抗战充分显示了中国作为大国的抗战力量 ”, 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历史契机 “变为现

---

① 刘存宽: 《重新评价 1945 年<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② 俞辛焞: 《“满洲国问题 ”与日本的战时外交》, 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③ 杨天石: 《孔祥熙与抗战时期的中日秘密交涉》, 《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
④ 石源华: 《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 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实”。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民政府的努力分不开。国民政府通过战时外交政策推动了这些目标的实现。“英美、主要是美国,在抗战期间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着策略和战略双重目标”。抗战期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现实的,又是虚幻的,表现为一个历史命题的二律背反”。“中国国际地位问题上虚幻与现实的矛盾,主要根源于一种人为的因素,即西方的‘给予’。”“经济实力的薄弱必然要影响到国家总体实力,决定了国家不可能有较高的国际地位。”因此,“一方面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国际地位的有限提高,另一方面国际平等与独立尚未完全获得,所谓大国地位就必然带有一定的虚幻性。①

七　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

1995 年值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者们对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讨。

对于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评价,张霖认为:促使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应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和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反侵略斗争。但广岛原子弹爆炸,促使日本政府转变态度,认真反省“一亿总玉碎”战略在先进武器毁灭性打击下的价值。原子弹造成的巨大伤亡粉碎了日本反抗到底的幻想,更加速了苏联对日宣战。原子弹轰炸牺牲了广岛几十万人民,却拯救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减少了人民在战争中的伤亡。广岛原子弹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②

徐康明论述了日本在败降过程中维护天皇制的活动:败降前“以战求和,维护国体”;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以保留天皇制为条件;败降后宣扬“托庇于国体之恩收拾战局”,要求美国“通过日本

---

① 王真:《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② 张霖:《原子弹对促使日本投降的历史作用》,《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4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政府实行占领政策”。美国占领军改变初衷，对日本进行间接统治。麦克阿瑟免除天皇作为战犯起诉。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竭尽全力维护天皇制，隐藏着军国主义准备东山再起的深沉意图。[①] 徐京城论证：日本投降后中共军队歼灭已经向盟国和国民政府投降，但拒绝向中共军队投降的日伪军，夺取其据守地区的军事行动，已不是继续抗战和战略反攻，而是国共双方为争夺胜利果实之战。[②]

郭大钧、吴广义著《浴血八年树丰碑——受降与审判》[③] 一书，对中国战区接受日本投降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的情况作了系统的论述。李荣著文对国民政府成立处理侵华日军战犯的领导机构，拟制有关法规，逮捕、引渡战犯，组织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作了概要论述。[④]

孟国祥、喻德文著《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⑤] 一书，对日本侵华战争加于中国的严重损失和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建立索赔机构，对日索赔情况，以及“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对日索赔的中止等作了系统论述。孟国祥、张庆军著文依据以往掌握的资料论述抗日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人数，为2100万。[⑥] 军事科学院对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军民伤亡数字和财产损失情况重新作了研究估算：伤亡总人数为3500万人，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⑦]

郭希华撰文论述了抗战期间和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下设立战争损失调查机构和索赔机构的情况，认为调查有困难，不彻底，资料不全。他分析索赔未能实现的原因是：波茨坦公告以拆迁日本设备为赔偿主要手段，盟国对处理日本国外资产严重分歧，

---

① 徐康明：《日本在败降过程中维护天皇制的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② 徐京城：《对中共武装解决拒降日伪军作战之管见》，《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
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④ 李荣：《国民政府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略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⑤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⑥ 《关于抗日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数字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⑦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625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对分配赔偿资财的原则未定，后来美国对赔偿政策改变（因美苏对立），不向日本索赔。[①]

八　有关日本的战争责任和认罪态度

一些学者对照分析日本与德国败降后对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无论是战争责任，还是赔偿责任，认罪态度均迥然不同。林治波认为：战后德国政府和80%的民众对纳粹发动侵略战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具有正确的立场，而日本大不相同，对侵略战争缺乏反省，“大东亚战争”史观普遍遗存。其原因是：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清理和“战后改革”均不彻底，未追究天皇责任，保留了天皇制；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岛国心态”；因经济繁荣滋生了傲慢心理。由于掩盖战争真相，年轻一代对战争几乎一无所知，这加深了其反省侵略战争的困难。[②]

姜维久比较了日本与德国对战争赔偿的不同态度：德国战后支付的战争赔款已达651亿美元，最终总计达880亿美元，此外还向受害者个人支付赔款。但日本向亚洲一些国家只支付战争赔款18亿美元，没有向民间受害者个人赔偿。但日本对其本国所谓战争受害者给予巨额补偿，达3888亿美元。日德对战争认罪的态度也形成强烈反差。日德对赔款的政策行为完全不同，有国际环境不同的原因，也与索赔方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差异直接有关。他认为：当年战胜日本是先烈们的业绩，而战后对日索取赔偿，是今天活着的人的义务。[③]

中国史学界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侵华战争性质，否认侵略罪

---

① 郭希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损失调查及赔偿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② 林治波：《从德日比较看日本为何不能坦诚地反省侵略战争》，《抗日战略研究》1995年第3期。

③ 姜维久：《日本与德国战后国家赔偿及个人受害赔偿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行和战争责任不断给予批判。沈予《论战后日本存在的“皇国史观”变种——侵略有理史观》一文，运用大量史实进一步作批驳：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均为日本事先策划、强行挑起，绝非因中国“收回国权”“排日侮日”所引发，所谓日本动用武力乃系“自卫”等说法纯属狡辩。日本对华战争是日本使用武力侵犯中国主权、领土完整，把中国变成日本殖民地的侵略战争，绝不是建立“睦邻关系”“重建东亚”的“道义战争”。以“南京大屠杀”和“七三一”细菌部队为例，日军杀戮规模之巨大，残暴行径之恶劣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日本否认战争罪行的实质在于否认应承担的战争责任。战后日本的“侵略有理史观”，是战前“皇国史观”在新条件下的复活和变种。[①] 针对日本一些人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是把亚洲人从欧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谬论，张宪文揭示当年日本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其目标是建立东亚大帝国，对整个亚洲进行殖民统治，其侵略性、奴役性、掠夺性、残暴性是无法抹煞的。[②]

在《抗日战争研究》组织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如何深入”笔谈中，学者们在肯定近些年抗战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发表了看法，认为应当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克服偏见、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深入挖掘和编纂整理史料；拓宽领域，加强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军事史的研究，加强专题研究；加强与台湾和海外的学术交流，对台湾和海外的史料、研究成果加强评介；研究者要提高理论水平，学术界要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大家期盼抗战史研究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写出真实可信流传久远的抗日战争全史来。[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① 《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3 期。

② 张宪文：《评大东亚战争史观》，《求是》1995 年第 13 期。

③ 《抗日战争史研究如何深入（笔谈）》，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 1—2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